

台灣風雲 名人錄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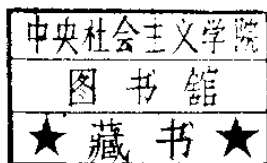
李 達 編 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39.6 2-68200

台灣風雲名人錄

(第二集)

李達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7.02

書名：台灣風雲名人錄（第二集）

著者：李 達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7年1月初版

1987年5月再版

定價：港幣25元正

書號：ISBN 962-226-110-8

目 錄

李煥：台灣開明派的象徵？	1
沈昌煥：台灣「夫人派」的代理人	21
毛鈞年的堂兄毛松年	29
宋美齡：「我將再起」？	37
蔣家三代的外戚	51
宋美齡的姨甥孔令傑	
——石油大王和他的神秘別墅	67
費希平和民主進步黨	83
台灣黨外人物的勢力劃分	93
黃順興、張春男和胡耀邦的對話	113
林正杰入獄前夕的自我剖析	123
余登發和「余登發案」	141
許信良與「中壢事件」	155
〔附〕「中壢事件」來龍去脈	167

李煥：台灣開明派 的象徵？

李煥是台灣國民黨現任中常委、具有權力的「十二人小組」成員之一。在蔣經國身體不行，台灣政壇風吹草動之際，李煥是一個「強勢」中常委，一位舉足輕動的人物。

關於李煥，過去和現在都有着種種傳聞。

李煥：台灣「開明派」的象徵

他曾經被海內外視為台灣開明派象徵的人物，當年傳說曾與王昇為首的保守派，展開路線鬥爭。一批海外台灣知識分子，當年甚至發動「倒王擁李」運動，以為李煥上台，台灣才有可能繼續民主化。他們的行動反映出人們對開明政治的憧憬和期望。

從高峯跌落，又再爬上來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近十年來，



▲李煥和蔣經國的關係始於三十年代，人們注意着：在台灣未來的劇變中，李煥會採取什麼態度？例如對突然成立的「民主進步黨」，國民黨就沒有採取斷然鎮壓措施，這是「開明派」的明智之舉嗎？

李煥從高峯跌落，又再爬上來，在國民黨內，這種事例是極少見的。

而不論事實如何，台灣民間當年「倒王擁李」運動，提高了大家對李煥的不切實際的期待，也增強了國民黨內反李煥的力量。因為，在國民黨內而言，李一人開明，別人豈不都成為保守？李一人進步，別人豈不成為進步的絆腳石？所以，在「中聯事件」之後，國民黨內對他落井下石者甚多，使他從政壇上半退隱了六年之久。對他今天的再度躍起，人們又應怎樣看待呢？

蔣經國最重用的是自己的親屬家人，例如蔣緯國，現在是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孝武雖不長進，也外調為駐新加坡商務辦事處副主任；他與章亞若所生的章孝嚴，最近擢升為台灣外交部常務次長。

其次，蔣所重用的是家臣親信，如俞國華、李煥、汪道淵等。李煥和蔣經國的主僕關係，開始於三十年代，至今已有半個世紀的時間。

李煥與蔣經國的關係，遠不如王昇來得早而且親。一個是幹校系統，一個是贛南系統。李煥到台灣後，一直從事黨務工作，也是蔣經國初上任實行本土化政策的執行者。

人們都知道，他是蔣經國的親信。但他與蔣經國的關係，卻還不如王昇來得早而且親。

李煥早年出身於上海復旦大學，後來才到幹校一期受訓。然後先到西北，後到東北國民黨部隊當政工軍官。而王昇則自贛南時代即幫「蔣專員」做事。王、李應該是在幹校受訓時才互相認識的。

現在台灣人把幹校系統跟贛南的混為一談，其實在當時有很大不同。因為，幹校學生之中有些像李煥一樣先畢業於一般大學，再去受訓；而贛南系的在學歷上自然要差一大截，但贛南系幫小蔣打天下，屬於真正嫡系，幹校學生則不盡然。

到台灣之後，李煥在「反共救國團」幫蔣經國做事，逐漸受到重用。但是不論李或王，因為長期在蔣經國手下做事，而蔣經國當時還未得勢，做手下的必須壓抑謙恭，盡量保持低調，以免滋生猜忌和誤會，特別在蔣經國與陳誠互相摩擦的階段更是這樣。

李煥後來一直從事黨務工作。三十多歲即在國民

黨中央黨部第一組第一室當總幹事，後來當台灣省黨部主委和組織工作會主任，前後將近三十年。其中實際上負責選舉和組訓的時間，幾乎長遠十年。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這十年之間，是國民黨到台灣三十年來，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變化最大的時間。也是蔣經國經過數十年的歷練，在一片期待改革的潮流之中，乘機接管政權、鞏固政權的時期。當時，內外環境已經很明顯地看出，國民黨必須逐漸放棄把台灣當作反攻基地的「踏板」心態，只有建設台灣，經營台灣，才是現實可行辦法。蔣介石死後，宋美齡離台赴美，一去十一年，蔣經國乘機實行「崔苔青」（培植台灣青年幹部）和本土化政策。

而李煥正是負責執行這個政策的關鍵人物。

在李煥執行黨務的時期，由於國民黨在提拔官員方面的力量甚大，在李煥門下奔逐者遂絡繹於途，施啟揚，高育仁、許水德等等，都是李煥一手提拔起來的。

蔣經國的開朗形象和作風，帶來了台灣人改革的希望，當時改革的呼聲主要是以《大學雜誌》為基地，《大學雜誌》在蔣經國的支持下，發動了改革運動，知識分子首次有了一個鼓吹改革的論壇，一時對前途充滿期待，對蔣經國也充滿期待。

當時蔣經國每天接見各種人，聆聽大家對國是的建言。有一次，蔣經國聽到一位年輕人滔滔不絕地對當時政治上貪污風氣的批評之後，他靜靜地說，「貪

汚的事情還不只這樣，我知道得還更多。」這話讓年輕人感動得很：這使人們認為，蔣經國也有滿腔改革的誠意，只是權力不夠，大家對他的支持力量還不夠大到足以使他能夠推動改革……

這類形象，使大家對蔣經國的組閣，充滿期待。

其時，李煥以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的身份，每天接見不少人。宋時選以「反共救國團」執行長的名義也見不少人。當時，台灣許多滿腔熱情，對政治熱心的青年，都以見到蔣經國、李煥或宋時選為榮。其中尤以大學生、研究生和留學生最多。

那時，國民黨開始大量起用台籍人士，所謂「青年才俊」和「吹苔青」的名詞，就是那時候喊出來的。

當時，國民黨在提拔人才方面的力量甚大。在李煥門下奔逐者更是絡繹於途。

▼ 施啟揚最近聲言要嚴厲實行黨禁，他和高育仁、許水德、吳伯雄等國民黨中常委年青要員，都是李煥一手提拔出來的。



▼許水德



▼高育仁



◀台灣內政部長吳伯雄，是新任的國民黨中常委要員，和蔣家關係密切，林洋港出掌後法院，蔣緯國、嚴家淦、沈昌煥、馬樹禮紛紛傳出病訊之際，吳伯雄的地位可能會上升。

李煥聲勢最大時總管三個重要關口，國民黨中青年人才幾乎都是他的門生，這是他今日的本錢所在。

李煥長期負責選舉和組訓，對地方事物知道最多，他又手操提名大權。從辦理增補選開始，每次數百位地方人物爭取提名，人人都巴望見到李煥一面。

當時，國民黨黨務幾乎是包辦式的，提名等於當選。「李主任」大名遠揚。張寶樹身為秘書長，但是海內外但知有「李主任」，而不知有「張秘書長」。

在他聲勢最大時，他同時身兼三個重要職位，即國民黨組工會主任、反共救國團主任和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其中救國團主任是他從蔣經國手中接過來的，而革命實踐研究院，本來是蔣介石本人負責主持。如今這兩個位置，都同時由他兼任，當時他的權勢，真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救國團負責青年學生、組工會負責組織和選舉提名，革命實踐研究院負責黨員的訓練，這三個地方是國民黨招訓、提拔和培養人才的三個管道，李煥總管這三道關口，國民黨人才都成為他的門生。

這段經歷，使他成為國民黨高級政要之中，最了解台灣地方政治的人。幾乎所有的國民黨本省籍政客，都跟他有關係，他對每個人的能力、個性、背景、關係、利害、各派系的矛盾，都有所了解。他對地方問題和選務的分析，也無人能出其右。

這個時候，他的頭上似乎有了光圈。他到立法院去，有立委趕快趨前幫他開車門。一些增額立委到立法院報到後，還要爭着趕到中央黨部向他請安。

他到任何地方去，都圍着一批急着拍馬奉承的人，他走起路來，似乎也有風。

「樹大招風」、樹敵不少

連帶着他的學者出身的副主任李良貴，當時雖然

仍是立委身份，但在立法院人人看到他，都要站起來打招呼。

官場上，「樹大招風」是大忌。

李煥也不是不知道，他看到人很親切客氣，堆滿笑容，儘量謙虛，傾聽來客的高見。但是，在複雜的國民黨體系中他事實上已經製造了不少敵人。他的聲勢愈高，越令人側目，許多政敵背後扯他後腿，等待他的樓房早日塌下來。

當時，王昇和李煥都在積極拉攏人才，兩人都是大門八字開，但是王昇是向內開，李煥是向外開。

當時王昇和李煥都在積極拉攏人才，培植政治勢力。但是兩人的作風很不一樣。

兩人都是大門八字開，但是王昇是向內開，李煥是向外開。內開和外開，有很大的不同。

大門向內開的王昇，主動的、有選擇性的找人來談。通常是有人向王昇介紹某人，王昇決定見之後，就由參謀負責聯絡，說「王主任想要拜訪您，不知您何時方便？」聽到王昇要來拜訪，大部分的人都十分受寵若驚，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竟如此受到賞識，第一個反應一定是「那裏敢勞駕，我去看他！」於是約好時間見面。

王昇選擇要見的人，大都是王昇認為有名聲、地位、潛力或對他有所幫助的人。他每天見五個到八個人，幾年下來，也約見了不少人，形成一股勢力。後來王昇的勢力從政工系統逐漸延伸廣佈於黨政工商和新聞界，即是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的基礎。



▲王昇這位反共頑固派的代表已經失勢了。

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也每天排隊等着要見李煥，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所求於他，希望他幫忙。他不能像王昇一樣可以有所選擇，也很少時間主動去找人，大都等在辦公室見客。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看到他一次，到外面就可以吹一個月的牛，說他和李主任多熟，要讓所有人都誤以為他是李煥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下台，只是時間早晚的事，即使沒有「中壢事件」，他還是非下台不可的。

李煥與許信良的關係，是他 下台的導火線，但不是主要的原 因。

當時，台灣的社會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戰後土生土長，在西方民主自由價值體系教育下的新生代已

經成長，農村和家庭結構逐漸溶解。以外貿為基盤的工商業正在帶動經濟起飛，各種社會力量還在蠕動，政治力量正在醞釀之中。

但是國民黨領導階層仍然沒有感受到這種變動。台灣國民黨黨務工作從以前的指導式作風，變為包辦性作風，提名即當選仍被視為當然。所以在1977年選舉的小小失利，被視為天大的災難。1977年「中歷事件」一把火，使國民黨驚覺到他們對台灣的社會和羣衆，根本缺少了解，一時之間驚慌得亂了手脚，蔣經國親自坐鎮在中央黨部指揮處理這次事件。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破天荒的事，一夕之間，驚醒起幾近三十年的安穩日子。

大挫敗必須有人承擔責任，李煥是衆矢之的。

一些平常對他不滿的人，全部跳出來，有人捅一刀，有人踹一脚，火上加油，落井下石。

在台灣政壇上搞政治，猶如 一大堆爪子多的螞蟥，擠在一個 小籠子內，互相抓來抓去……

當時謠言最多的是，他利用提名的權力，接受數百萬、數千萬，乃至數億的賄賂。說他有很多房地產，在海外更有很多投資。

其中言之鑿鑿的是，高雄市長王玉雲送他二千萬，才獲得提名連任的機會。

由國民黨中央組成十人的調查小組，分赴各地調查，也提出了許多對他不利的報告，說他如何培植私人勢力，結黨成派。

這十人調查小組，大部分是老立委，聽說這十人的名單是秘書長提寶樹擬定的。張寶樹當的秘書長，

內有副秘書長秦孝儀，外有組工會主任李煥，使他徒有虛位，沒有實權，平常備受壓抑，遇此機會，幸災樂禍之餘，也想藉此出點鳥氣。

不過，這也儘只是傳聞而已。

在台灣這種地方搞政治，常常是屬於「螃蟹籠子式的政治」。一大堆爪子多的螃蟹，擠在一個小籠子內，互相抓來抓去，是非甚多，損傷甚多，無人倖免。

從1974年開始，海外似乎都相信國民黨內部有兩條路線的競爭，一條是在台生根派，一條是反攻大陸派。

從1974年開始，海外有許多人相信，國民黨內部有兩條路線的競爭，一條是在台生根派，一條是反攻大陸派，即開明派與保守派之爭。開明派以當時的組工會主任李煥為象徵，保守派以當時的政戰部主任王昇為龍頭。

這種對國民黨二分法式的認識論，一度在海外很流行，所以一些關心台灣前途，希望台灣邁向民主自由的評論家，逐漸形成「擁李倒王」運動。這個運動間接為李煥製造不少政敵，導致李煥下台，但是它在後來王昇勢力如日中天之際，仍然形成一股抵制王昇的輿論，一直持續到王昇下放中南美，完全失勢，李煥出任中常委，大權在手才停止。

從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以來，早期有關陳誠和蔣經國之間的競爭，傳聞很多，但是基本上那是派系權力之間的競爭，而非路線和政策的競爭，只有李、王之爭，才有一點路線之爭的味道。

依當時「擁李倒王」運動者的看法，國民黨逐漸

開放政權，以挑選夥計方式，起用台籍人士，有其客觀環境的需要。李煥要在工作上要爭取羣衆支持，因爲工作的需要而自然容易傾向於開明與實際的路線。而掌握政工和特工的王昇，在工作上並沒有廣爲吸引台籍人士的需要，而其工作單位的中上幹部，也大多數是死硬反共的大陸籍軍人和特工，他們在工作上長期以「匪諜」、台獨爲對象，因此很難使之能夠安心地開放權力給台籍人士。

這種因工作性質而產生的職業化心理，舉世各國皆然，並非限於台灣。例如，各國右傾獨裁政權多由軍人政變而成，即因軍人職業化訓練，使之不能忍受沒有秩序的自由，他們偏重的是紀律與服從，是團體的榮譽而不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但是基本上，王李之爭，談不上路線之爭，因爲在國民黨而言，只有一條路線，就是蔣經國路線，王昇和李煥都是蔣經國的人，都以蔣經國爲效忠對象，他們所作所爲，都秉承蔣經國的旨意、信任和授權。一左一右，一白一黑，一文一武，如果說有兩條路線，那麼這兩條都是蔣經國要的，剛柔並濟兩條合起來，才是蔣經國路線。從最後台灣黨外人士紛紛被捕入獄，組黨大遭禁制，刊物紛被查封，可見一斑。

美國政治評論家阮大仁在李煥前幾年當家時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明白地指出：

「用行爲科學的觀點去看，我認爲國民黨的決策過程是垃圾桶模式(garbage model)，即將許多因素摻雜在一起，並無確定的混合方式。好像堆垃圾一樣，同樣的垃圾，每次推出的形式層次並不相同。拿傳統的名詞來說，國民黨決策層處理事務，並無制度，一切均是政治解決，採協商方式，結果就要看衆多協商者個別的實力、態度與理由而定。因此國府的行爲，

往往把手段與目標相混，而在一連串暫時性的手段交替使用時，又因情況改變，所需要的手段因之改變，以致有時竟然會前後矛盾。」

幾年前李煥的下台，是台灣政治發展的分界點。它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在台灣中山大學的日子

李煥下台後，在台灣中山大學的幾年，是李煥一生中最特殊的一段光陰。

他下台之後，表面上從無一句怨言，只是埋頭於籌備中山大學的建校工作。有時候與人談到以往，當訪客稍微感覺到他淚光閃現之前，他就離座轉身去做一點別的事，再回來時已轉到別的話題去。

因為他的背景，他建校時，各界都很幫忙。國防部長親自陪他去決定西子灣的校地，高雄市長王玉雲及工商界和政界人士都對他十分賣帳。他為台灣中山大學募款時，得到工商界熱烈捐獻，使他辦校經費相當豐裕，校舍蓋得不錯，又從台灣大學高薪聘請名家來高雄教書。

他走紅時代，在島內外各角落都建立了不少勢力和朋友，在高雄期間，很多人跑去看他，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下台後即不可能再復出，所以另找靠山，別有懷抱。在復出之前，看他的人是越來越少。

他在高雄辦校，與學生生活在一起，在餐廳與學生一齊排隊用餐，繼續培植他的實力，他着眼的是未來。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國民黨辦黨務的老黨工，怎有資格辦學校？他辦教育會不會把學校辦得像國民黨黨務訓練班一樣？